

# 藝術 新視

## 第五輯

策 划：謝福文  
主 编：徐鼎一  
副主编：楊一家

篆  
隸

第五辑

策 划：谢福文  
主 编：徐鼎一  
副主编：杨一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衡. 第5辑/徐鼎一主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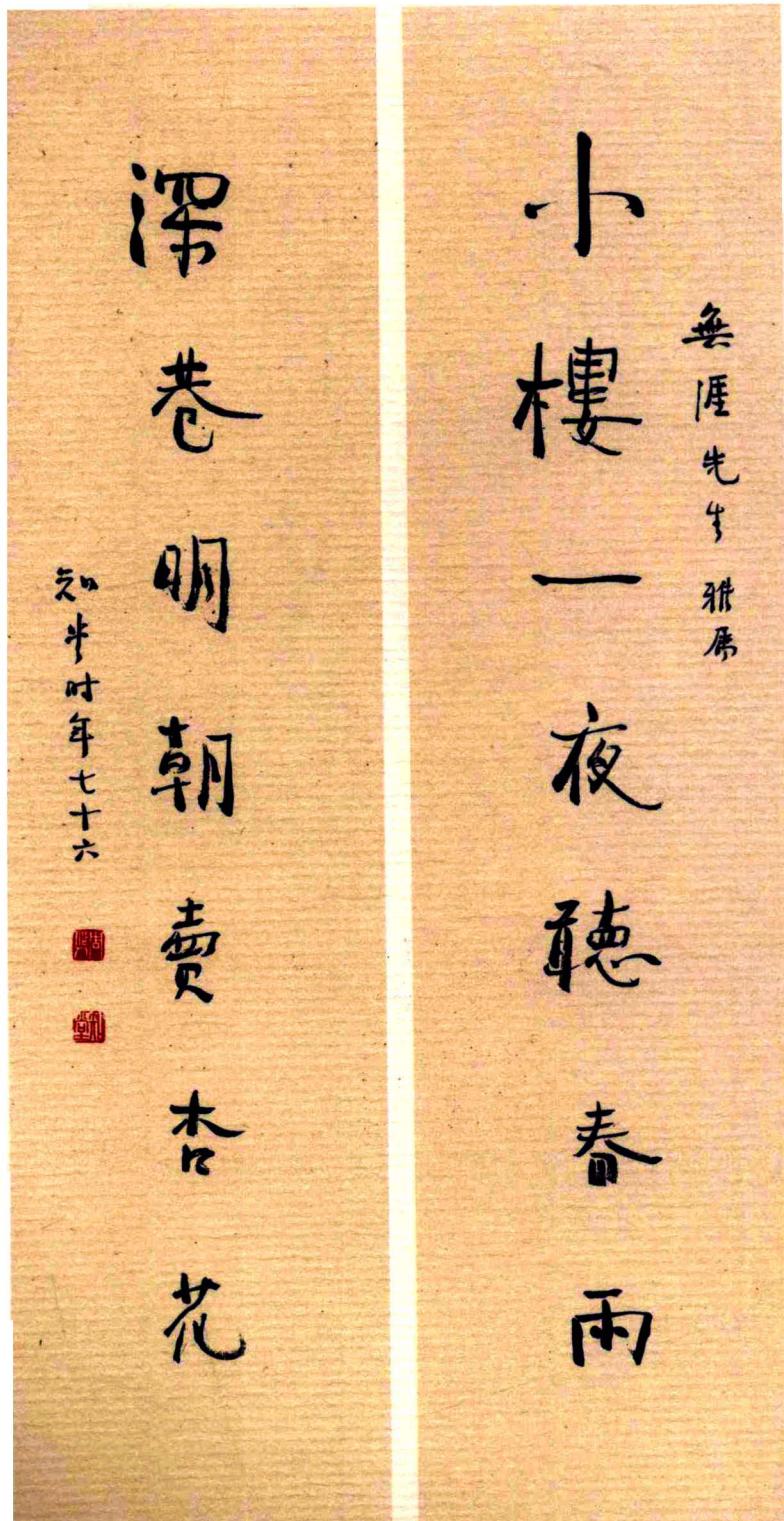
ISBN 978-7-5013-4599-1

I . ①艺… II . ①徐… III . ①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IV .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596号

顾 编	问 委	文怀沙 杨一家 潘建国	冯其庸 徐鼎一	程大利 谢福文	朱良志 赖洪喜
书 策 主 副 主 编	名 划 编 编	艺衡 第五辑	谢福文		
出 发 地 经 责任 执行 版式 印 开 印 版 书 定	版 行 址 销 编辑 执行 设计 刷 本 张 次 号 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部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七号 全国新华书店 耿素丽 李满意 蔡金存 箫 泉 787mm × 1092mm 11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3-4599-1 48.00元	徐鼎一 杨一家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七号 全国新华书店 耿素丽 李满意 蔡金存 樊 怡 南秀渊 董 芳 箫 泉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787mm × 1092mm 1/16 11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3-4599-1 48.00元		



释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款识：无涯先生雅属。知堂时年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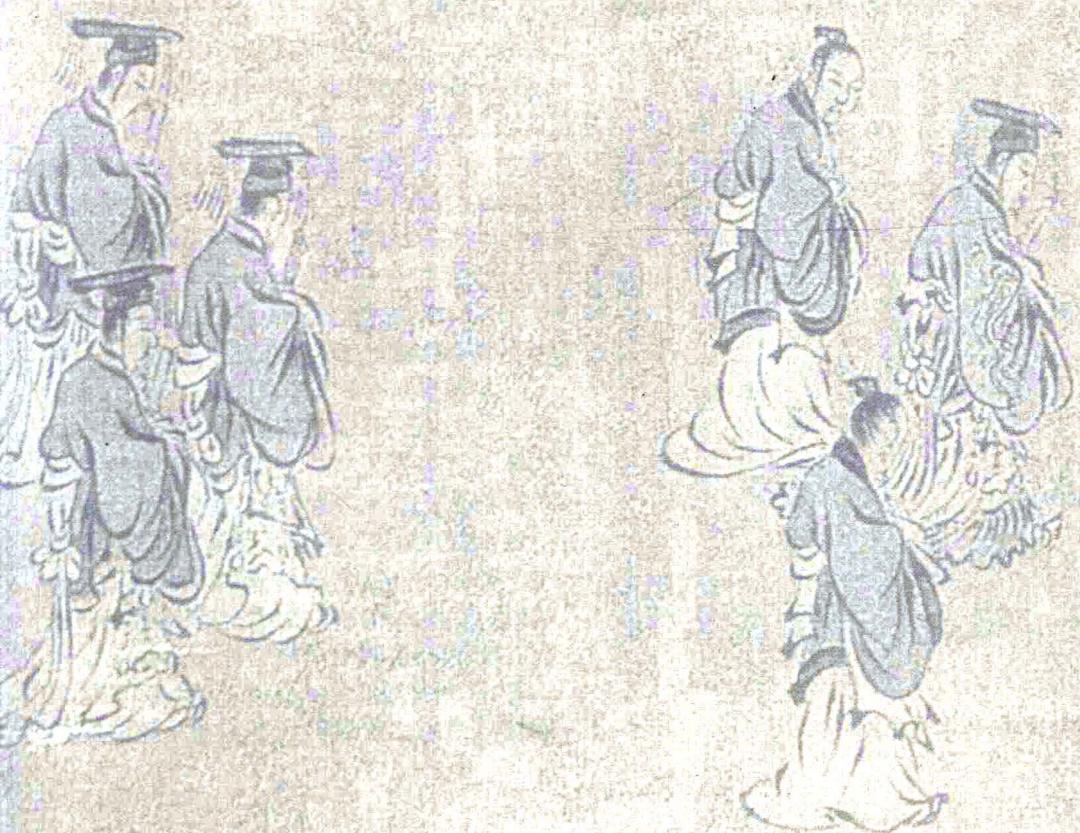
钤印：周作人（白文方印）、知堂（朱文方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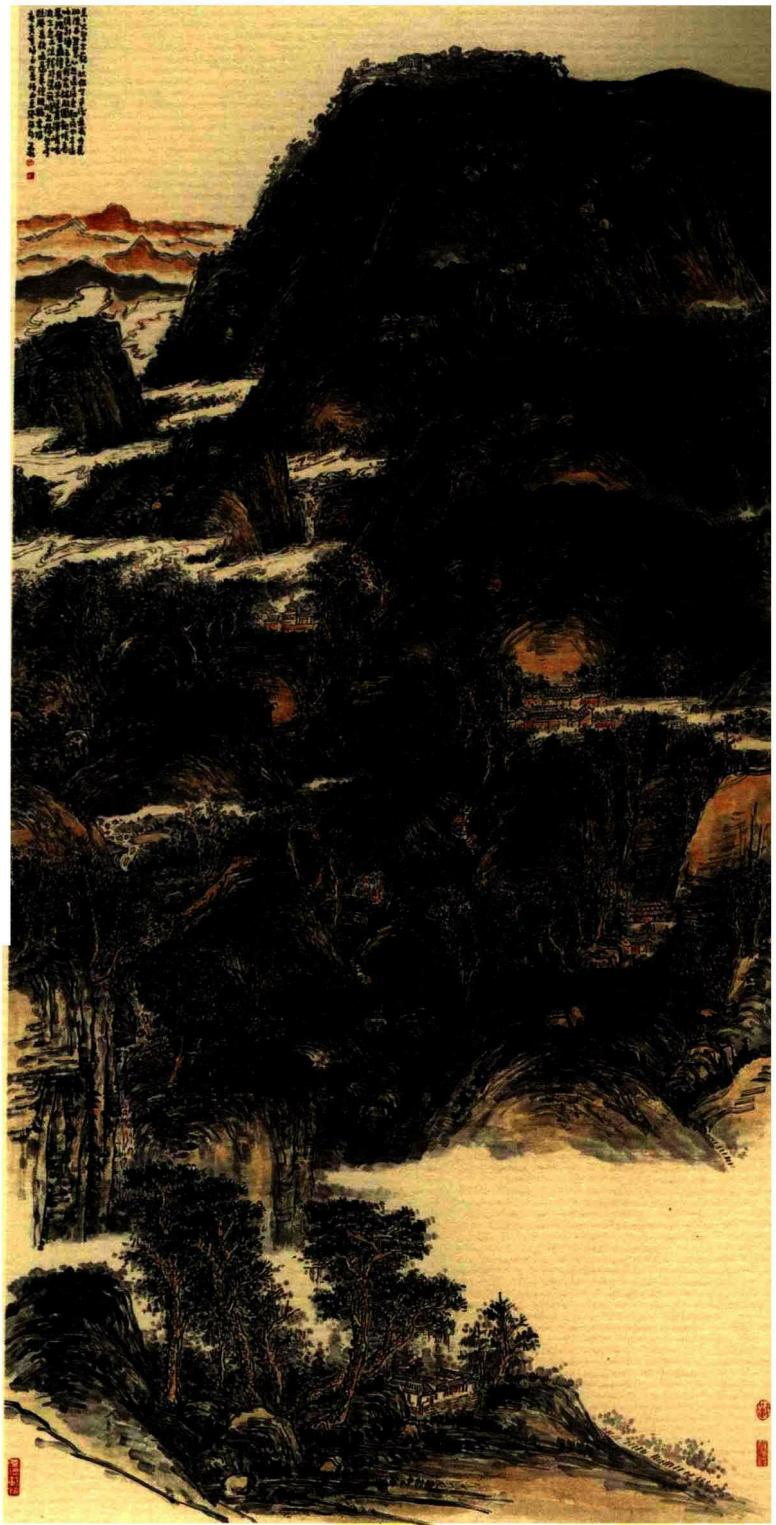
周作人（1885-1967）

号知堂，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知堂文集》等，诗集《过去的生命》，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著《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周作人 行书七言联 水墨纸本 136cm×34cm×2

承继传统·研究古学·读书明理·陶养人物





杨一家 云水禅心 250cm×125cm 2010

【收藏苑】

141 黄庭坚《行书懒残和尚歌》卷及其文献题跋

万新华

- 【书画苑】 103 冰痕雪影——倪瓒山水解读（下） 查律  
112 张彦远「自然」与朱景玄「逸」之关系辨 樊艳芳  
119 儒道思想对黄宾虹画的影响 杨一家  
131 袁行霈书法作品 袁行霈

- 【诗文苑】 91 澳门三家诗词选 冯刚毅 冯倾城 龚刚  
96 莫州八咏 梁东  
97 还研阁诗选 范培南  
98 赵大民诗词选 赵大民  
100 紫石斋序跋 漆永祥

- 【经苑】 69 明代经学的发展路向及其渊源 饶宗颐  
74 元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初探 顾永新  
82 试论当代语境下「经学」的内涵与「经学史」的研究领域 程苏东  
25 怀念国学大师谢无量先生 谢无量先生文集序 冯其庸  
36 问题与方法：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五 邓曦泽  
52 「气」之义证 韩刚

- 【学苑】 1 悔过自新说 李颙  
6 《明夷待访录》解读之商榷 李广柏  
18 国文研究法——治古 钱基博  
25 怀念国学大师谢无量先生 谢无量先生文集序 冯其庸  
36 问题与方法：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五 邓曦泽  
52 「气」之义证 韩刚

# 悔过自新说

李 颛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也者，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性之量，本与天地同其大；此性之灵，本与日月合其明。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人多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渐剥渐蚀，迁流弗觉，以致卑鄙乖谬，甘心堕落于小人之归，甚至虽具人形，而其所为有不远于禽兽者。此岂性之罪也哉？然虽沦于小人禽兽之域，而其本性之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未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顾人自信不及，故轻弃之耳。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光体未尝不在；又如宝珠陷于粪坑，而宝气未尝不存，诚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则垢尽秽去，光体宝气自尔如初矣，何尝有少损哉！

世固有抱美质而不肯进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一眚自弃。迨其后虽明见有善可迁，有义可徙，必且自诿曰：“吾业已如此矣，虽复修善，人谁我谅耶？”殊不知君子小人、人类禽兽之分，只在一转念间耳。苟向来所为是禽兽，从今一旦改图，即为人矣；向来所为是小人，从今一旦改图，即为君子矣。当此之际，不惟亲戚爱我，朋友敬我，一切人服我，即天地鬼神亦且怜我而佑我矣。然则自诿自弃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

多辞说。愚谓不若直提“悔过自新”四字为说，庶当下便有依据，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

或曰：“从上诸宗，皆辞旨精深，直趋圣域，且是以圣贤望人；今吾子此宗，辞旨麤浅，去道迂远，且似以有过待人，何不类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云蔽之也，云开则日莹矣。吾人所以不得至于圣者，有过累之也，过减则德醇矣。以此优入圣域，不更直捷简易耶？”



《二曲集》书影 清康熙刻本

疑者曰：“《六经》《四书》，卷帙浩繁，其中精义，难可殚述。‘悔过自新’宁足括其微奥也？”殊不知《易》著“风雷”之象，《书》垂“不吝”之文，《诗》歌“维新”之什，《春秋》微显阐幽，以至于《礼》之所以陶，《乐》之所以淑，孔曰“勿惮”，曾曰“其严”，《中庸》之“寡过”，孟氏之“集义”，无非欲人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耳。正如《素问》《青囊》，皆前圣已效之方，而传之以救万世之病，非欲于病除之外，别有所增益也。曰：“经书垂训，实具修齐治平之理，岂专为一身一心，悔过自新而已乎？”愚谓：“天子能悔过自新，则君极建而天下以之平；诸侯能悔过自新，则侯度贞而国以之治；大夫能悔过自新，则臣道立而家以之齐；士庶人能悔过自新，则德业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弗包举统摄焉！”

杀人须从咽喉处下刀，学问须从肯綮处着力。悔过自新，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已，苟真实有志做人，须从此学则不差。

天地间道理，有前圣偶见不及而后圣始拈出者，有贤人或见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证，斯已耳。予固庸人也，懵弗知学，且孤苦颠顿，备历穷愁，于夙夜寐旦、苦搜精研中，忽见得此说，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他，故敢揭之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漫置之，是犹恶贫女之布而甘自冻者也。

前辈云：“人生仕宦，大都不过三五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载不朽。”愚谓：“舍悔过自新，必不能立身，亦非所以行道，是在各人自察之耳。”

今人不达福善祸淫之理，每略躬行而资冥福，动谓祈请酬谢，可以获福无量。殊不知天地所最爱者，修德之人也；鬼神所甚庇者，积善之家也。人苟能悔过于明，则明无人非；悔过于幽，则幽无鬼责。从此刮垢磨光，日新月盛，则必浩然于天壤之内，可以上答天心而祈天永命矣，又何福之不臻哉！

吾之德性，欲图所以新之，此际机权，

一毫不容旁贷。新与不新，自心自见，譬如饮水，冷暖自知。久之德充于内，光辉发于外，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厥初用功，全在自己策励。

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者，复其故之谓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体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故能常新。若于本体之外，欲有所增加以为新，是喜新好异者为之，而非圣人之所谓名矣。

同志者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且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盖人之所造，浅深不同，故其为过，亦巨细各异，搜而剔之，存乎其人于以诞生圣域，斯无难矣。

众见之过，犹易惩艾；独处之过，最足障道。何者？过在隐伏，潜而未彰，人于此时最所易忽；且多容养爱护之意，以为鬼神不我觉也。岂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舜跖人禽，于是乎判，故慎独要焉。

凡者，事之微，而吉凶之所由以肇端者也。《易》曰：“知几其神乎。”又曰：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夫“有不善未尝不知”，故可与几也；“知之未尝复行”，故无祇悔也。吾侪欲悔过自新，当以颜氏为法。

吾侪既留意此学，复悠悠忽忽，日复一日，与未学者同为驰逐，终不得力，故须静坐。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是故程子见人静坐，便以为善学，何者？天地之理，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吾人之学，不静极则不能超悟。况过与善界在几微，非至精不能剖析，岂平日一向纷营者所可辨也。

悔过自新，此为中材言之也，而即为上根言之也。上根之人，悟一切诸过皆起于一心，直下便划却根源，故其为力也易；中材之人，用功积久，静极明生，亦成了手，

但其为力也难。盖上根之人，顿悟顿修，名为“解悟”；中材之人，渐修渐悟，名为“证悟”。吾人但期于悟，无期于顿可矣。

圣人之学，下学上达，其始不外动静云为日用平常之事，而其究则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人苟有纤微之过，尚留方寸，则性必无由以尽；性既不能尽，则命亦无由以至，而其去圣功远矣。故必悔之又悔，新而又新，以至于尽性至命而后可。

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庶几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昼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为肖子，在宇宙为完人；今日在名教为圣贤，将来在冥漠为神明，岂不快哉！

昔人云：“尧舜而知其圣，非圣也，是则尧舜未尝自以为无过也；禹见囚下车而泣，是则禹未尝自以为无过也；汤改过不吝，以放桀为惭德，是则汤未尝自以为无过也；文王望道未见，武王儆几铭牖，周公破斧缺斲，孔子五十学《易》，是则文、武、周、孔并未尝自以为无过也。等而上之，阳愆阴伏，旱干水溢，即天地亦必且不见以为无过也。”然而两仪无心，即置勿论。至于诸圣，固各有其悔过自新之旨焉。但圣人之悔过处，及其自新处，与凡人自不同耳。盖必至于无一念之不纯于理，无一息之或间于私，而后为圣人之“悔过”；必至于“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而后为圣人之“自新”。夫卑之虽愚夫妇有可循，高之至于神圣不能外。此悔过自新之学所为括精粗、兼大小、该本末、彻终始而一以贯之者欤！

横渠先生少喜谈兵，尝欲结党取洮西之地。康定中，闻范文正公仲淹为陕西帅，遂上书条陈兵务。仲淹异其气貌，又甚少，惜之，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先生乃大感，归读之，遂翻然志于道。然未知所从入，溺于释、老者累年，后悟其非，始反求之《六经》。嘉祐初，至京师见程氏二先生，二先生于先生为外兄弟之子，卑属也，而

学诣奥渊。先生与语道学之要，厌服之，因涣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上蔡先生少博洽，见程子于扶沟，从受学，语次举书史无遗失。程子曰：“贤记忆何多也？抑亦可谓玩物丧志矣。”先生惭，汗浃背，面发赤，因请为学之要。程子告以静坐。于是遂时时静坐，又作簿自记日用言动礼与非礼以自绳。其言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患恐惧，旦旦于危阶上习之；得善笔爱之，患长爱欲，书令坏乃已；患喜怒，日消除令尽而内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与程子别，一年来见，问所学，对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谓也？”先生曰：“怀固蔽自欺之心，长虚骄自大之气，皆此之由。”程子喜而告人曰：“是子为切问近思之学者也。”

晦庵先生初年学靡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自云：“某年十五六时，留心于释，盖尝师其人、尊其道而笃好之。年二十四，始见延平李先生言及学禅。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自此悔悟力改，无复向来病痛矣。”

草庐先生五岁，日诵数千言，夜读书达旦。母忧其劳过，节膏火调适之。先生伺母寝，辄篝灯诵习，遂博通经传。行省豫元明善以文学自负，问经传奥义，服之，太息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不可测也。”所著《易》《春秋》，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精明简切。而《礼纂言》，于礼学为尤切。晚岁颇悔悟，遂专以尊德性为主，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为学之本。其言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圣传不嗣，士学靡宗。汉唐千余年间，董、韩二子，依稀数语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张、邵兴，始能上通孟氏而为一。程

氏四传而至朱，文义之精密，又孟氏以来所未有者，其学徒往往滞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虽行如司马文正，才如诸葛武侯，亦不免于行不著、习不察，况止于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如北溪之陈，双峰之饶，于记诵词章之学，相去何能以寸哉！圣学大明于宋，而踵其后者乃如此，可叹已！澄也钻研于文义，毫分缕析，每以陈为未精，饶为未密也，堕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觉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内子而亥，一月之内朔而晦，一岁之内春而冬，常见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运转，如日月之往来，不使有须臾之间断，则于尊之道，殆庶几乎！”

敬轩先生初欲以诗文鸣世，后从魏、范二公讲周、程、张、朱诸书，叹曰：“此道学正脉也。”遂焚所作诗赋，专心于是，至忘寝食。尝曰：“吾奋然欲造其极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旧习有未尽去乎，旧习最害事，吾欲进彼则止吾之进；吾欲新彼则旧吾之新。甚可恶，当刮绝之。”又曰：“一毫省察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

近溪先生年十五从新城张洵水学，洵水每谓：“人须力追古人，不当埋没于举业，自弃厥身。”于是一意以正学自任。一日，诵《敬轩语录》云：“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数月而体未复。壬辰，闭关临田寺，几上置镜与孟水，对之令心与水镜无二。久之成疾，父忧之，授以《传习录》一编。循其言求之，病渐愈。庚子，入省赴大会，见颜山农，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动心。山农不许，曰：“是制欲，非体仁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体仁？”山农曰：“子不观孟子之论‘四端’乎。知皆扩而充之，

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如此体仁，何等直截。子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先生是时如大梦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师事焉。后忽遘重病，倚榻而坐，梦一翁来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则未也。”先生不应。翁曰：“君自有生以来，遇触而气不动，当倦而目不瞑，扰攘而气不分，梦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先生愕然，曰：“随物感通，原无定执，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结习。君今漫喜无病，不悟天体渐失，岂惟心病，而身亦随之矣。”先生大惊，伏地叩谢，汗下如雨，从是执念渐消。

阳明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词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

南瑞泉大吉守绍兴时，从学阳明先生，时时请益焉。尝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阳明曰：“何过？”瑞泉历数其事，阳明曰：“吾言之矣。”瑞泉曰：“何言？”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阳明曰：“良知却是我言？”瑞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来告曰：“与其过后悔改，不若预言无犯为佳也。”阳明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瑞泉笑别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曰：“身过可免，心过奈何？”阳明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点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瑞泉拜谢，由是得学问致力肯綮处。

董萝石汎，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诗闻江湖间。与其乡之业诗者十数辈为诗社，旦夕吟咏，至废寝食，遗生业，以为是天下之至乐也。已游会稽，闻王阳明讲学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诗卷访之。入门长揖，踞上坐。阳明异其气貌，且年老矣，礼敬之。又询知其董萝石也，与之语，连日夜。萝石退谓何秦曰：“吾闻夫子‘良知’之说，

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后知吾向之所为，日夜弊精劳力者，其与世之营营利禄之徒，特清浊之分，而其间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于夫子之门，则几于虚此生矣，吾将北面夫子而终身焉，得无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贺曰：“先生之年则老矣，先生之志何壮哉！”入以请于阳明，阳明喟然叹曰：“有是哉！吾未或见此翁也。虽然齿长于我矣，师友一也。苟吾言之见信，奚必北面而后为礼乎？”萝石闻之曰：“夫子殆以予诚之未积欤？”辞归两月，弃其瓢笠，持一缣而来，谓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织也，吾之诚积，若兹缕矣，夫子其许我乎？”秦入以请，阳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见此翁也。今之后生晚进，苟知执笔为文辞，稍记习训诂，则已侈然自大，不复知有从师学问之事；间有或从师问学者，则哄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诗训后进，从之游者遍江湖，盖居然先辈矣。一旦闻予言，而弃去其数十年之成业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礼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与于此？则如萝石固吾之师也，而吾岂足以师萝石乎！”萝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请矣。”入而强纳拜焉。自是日有闻益，充然有得，欣然乐而忘归也。其乡党之子弟亲友，与其平日之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为诗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耶！”萝石笑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方知悯若之自苦，而乃以吾为苦耶！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

杨庭显少精悍，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者。居常自视无过，视人则有过。一日，自念曰：“岂其人则有过，而吾独无过，殆未之思也！”思之，遂知所过；旋又知二三，已而纷然，乃大恐，痛惩力改。读书听言必自省，每见过内讼不置，即梦寐中怨艾深切，至于感泣。念虑智识之差，毫无自恕。嘉言善行，不旷耳目，书之盈室，著之累帙。尝曰：“如有樵童牧子谓余曰‘吾诲汝’，我亦当敬听之。”其自刻责者，类非形见，独发明以示戒，检身严而安所止，取善博而知所择。人患忿懥，则容物若虚；人患

吝啬，则捐财若无。或叹其不可及，庭显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

仇览为阳遂亭长，好行教化。有陈元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责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读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云：‘孤犊触乳，骄子詈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于是元遂修行孝道，究成佳士。

徐庶少好任侠击剑，尝乘忿杀人，白堊突面，披发而走，为吏所得。问其姓字，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维磔之，击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识者，而其党伍共纂解之得脱。于是感激，弃其刀戟，更练布单衣，折节学问，始诣精舍。诸生闻其前作贼，不肯与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义理精熟。与诸葛亮友善，俱为一时名士。

周处性凶狠，纵情肆欲，州里患之。一日，问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久之不出。人谓处已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恶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处遂励志好学，志存义烈，言必忠信。期年，州府交辟，卒为节义名臣。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浊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而吾曹乃多以一眚自弃，惜哉！

（本文选自《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3月第1版）

# 《明夷待访录》解读之商榷

李广柏

## 小引

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为台北三民书局《古籍今注新译》丛书译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并撰写《导读》。在工作中，我发现当今学界对《明夷待访录》有这样那样的误读及不恰当之解说，似应予以辨析。于是，不揣浅拙，就若干问题作了力所能及的研讨与考索。愚者千虑，亦有所得，遂乃撰成此文，以就正于研究明清思想史的专家和广大读者。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重要成员，天启年间被阉党害死于狱中。崇祯年间，年青的黄宗羲坚决同阉党余孽作斗争，声名传遍朝野。清军南下时，黄宗羲组织义兵在浙江地区抗击清军。鲁王朱以海以监国的名义在浙东建立政权，先后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察御史，又任命为左金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失败后，黄宗羲辗转藏匿，清朝政府四处悬赏缉拿他，屡屡濒临于危境。顺治十年（1653），鲁王朱以海逃到厦门，移居金门，被迫取消监国称号。顺治十八年（1661），永历帝在缅甸被俘。各地抗清的战争逐渐平息，清朝统治的基础稳定了下来，饱受战乱幸存下来的民众，也希望有和平安宁的生活。这时候，黄宗羲已年过半百。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黄宗羲看到恢复明朝再也没有希望，历史的变迁非人力所能扭转，于

是停止了实际的反清复明活动，转向讲学著书的学术事业。他早已有了经学、理学、史学的深厚根基，并广泛研读过天文、地理、历法、佛教、道教、数学、音乐等百家之书。讲学著书是他的本色。

顺治十年，黄宗羲还在东躲西藏的时候，就写了一本有关治国安邦的著作——《留书》。《留书》好像是《明夷待访录》某些篇章的初稿。“留书”的意思是留给后人去实行，同“待访录”的意思很相近。顺治十八年，黄宗羲陪母亲返回余姚黄竹浦故居。第二年，即康熙元年（1662），黄宗羲着手撰著《明夷待访录》。中间曾因家中失火暂时停笔。康熙二年完成《明夷待访录》一书。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构想的一部治国大纲，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的规划与建议，也有关于政治上最高原理的阐发。黄宗羲明经通史，又经历了社会的大裂变、大动乱，这本书是他研究历代“治乱之故”和明代亡国教训之后写成的。书中既闪耀民主启蒙思想的光辉，也发挥了儒家圣贤的社会理想。清朝末年，这本《明夷待访录》成为宣传民权共和的思想武器，对于近代中国“思想之骤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 书名的“明夷”二字怎么讲

书名《明夷待访录》，“待访”的意思是留待以后的明主圣君来访求并采用。黄宗羲处在“天崩地解”的乱世，对未来

却没有绝望。他相信天运终会好转，那时自己虽然老了，也会“如箕子之见访”，他设计的治国纲领，将交给明主圣君去践行，天下将会转为治世。箕子是商纣的大臣，纣王的亲属，曾因劝谏纣王，被纣王囚禁。周武王灭商以后，释放箕子，并亲自访问箕子，向箕子请教治国大法。箕子向武王陈说《洪范》。<sup>[1]</sup>孔子说：“殷有三仁焉。”<sup>[2]</sup>箕子是其中之一。黄宗羲以箕子自况，他所期待的君主，当然不是秦汉以后的那种专制皇帝，而是如同周武王、周文王、商汤、夏禹、尧舜那样的圣君。

《明夷待访录》的“明夷”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这样解释：

“明夷”：《周易》卦名，其卦象是䷣，坤上离下，象征日在地中，有智慧但被压制。此卦彖辞说：“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达其志，箕子以之。”黄宗羲乃明朝的遗民，自比于殷朝的箕子，等待开国之君的来访，故称此书为《明夷待访录》。<sup>[3]</sup>

新版《辞源》有两处解释：

“明夷，利艰贞。”《周易集解》注引郑玄：“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后因以喻主暗于上，贤人退避的乱世。《宋书·龚颖传》陆徽表：“臣闻运缠明夷，则艰贞之节显；时属栋挠，则独立之操彰。”清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即取此为义。

《易·明夷·爻》：“箕子之明夷。”意谓箕子身有明德而逢纣之恶，乃以明为暗。宗羲当易代之际，自感不遇，又不欲出仕，因取明夷为名。<sup>[4]</sup>

新近出版的由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所作的解释是：

《明夷待访录》之“明夷”二字，乃取自《周易》卦名，卦辞为“利艰贞”，《彖辞》解释说：“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以喻君子贤人处于艰难困苦的环境而志气不衰，坚持正道。<sup>[5]</sup>

以上这些解释大同小异，反映了当今

学界的一般看法。

“明夷”是《易经》的卦名，卦象为离下坤上（䷣）。卦辞是“利艰贞”。这都是对的。但学界从“明夷”卦的卦辞入手，将《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中的“明夷”二字，解读为“有智慧但被压制”，“君子贤人处于艰难困苦的环境而志气不衰，坚持正道”云云，并不符合黄宗羲的本意。《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前面，黄宗羲写有《题辞》，除交代写作经过之外，着重说明了他著书的意图，也对“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作了解释。

为了说清楚《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的涵义，这里将黄宗羲在书前写的《题辞》全文引出来（广柏标点）：

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爻，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识。<sup>[6]</sup>

从《题辞》可以看到，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的时候，相信胡翰的“十二运”之说，以为二十年后天运开始转入“大壮”，天下会由乱转治。他这本“条具为治大法”的著作，就是等待交入“大壮”以后的明主圣君来访求并采用的。“大壮”是《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卦象（䷡）为阳隆盛之象。黄宗羲写道：“……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爻，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意思是：在乱运没有

结束的时候，再好的治国方略也是不能起作用的。过二十年以后，天运转入“大壮”，就会出现治世。到那时候，自己虽然老了，或许同箕子差不多吧，会有明主圣君来访问，怎么能因为当今处于“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时，就隐秘自己的主张呢！“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是“待访”的意思。“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就是《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中“明夷”二字的意义。

“旦”，平旦，破晓。“融”，明亮。“夷”的意思是处在黑夜。“夷之初旦，明而未融”的意思是：黑夜刚破晓，太阳没有出来，天还没有明亮。换成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处于黎明前的黑暗。这句话来自《左传》，黄宗羲稍作了点变动。《左传·昭公五年》：“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孔颖达疏：“离下坤上为明夷。离为日，坤为地。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夷者，伤也。日在地中，光不外发，则为明伤也。”“明而未融，则融是大明……日明未融，故曰其当旦也。”<sup>[7]</sup>

黄宗羲说“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译成现代语就是，怎么能因为当今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就隐秘自己的主张呢！

《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完整的涵义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所写，等待黎明后的明主圣君来访求的著作。

黄宗羲因为相信二十年后天运交入“大壮”，有希望恢复“三代之盛”，他才“条具为治大法”（著《明夷待访录》）。我们将《明夷待访录》的“明夷”二字，理解为黎明前的黑暗，便与《题辞》里“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一句相照应，又与“‘大壮’之交，吾虽老矣”一句相照应。这样解释“明夷”，其“待访”“如箕子之见访”，就是期待黎明后（治世）的明主圣君来访。如果把“明夷”二字简单地理解为“君子贤人处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云云，不仅不能与《题辞》里“交入‘大壮’”“‘大壮’之交”相照应，而且“处

于艰难困苦的环境”却又“待君主来访”，就是不甘寂寞、希求闻达的心态。这岂是黄宗羲的为人！请读者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歧。过去确有学人误解黄宗羲的“待访”，笔者在后面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黄宗羲以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想法，是读了胡翰的“十二运”理论以后才有的。胡翰为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字仲申，号仲子，浙江金华人，著有《春秋集义》《胡仲子集》。《胡仲子集·衡运》篇交代，“十二运”的说法是从广陵人秦晓山那里听到的。<sup>[8]</sup>黄宗羲八十多岁在《破邪论·题辞》中写道：“余尝为《待访录》，思复三代之治。昆山顾宁人见之，不以为迂。今计作此时，已三十余年矣，秦晓山十二运之言无乃欺人。”<sup>[9]</sup>黄宗羲期盼“大壮”之交，过去三十年了，“大壮”之交的“治世”并没有出现。晚年的黄宗羲认识到，由秦晓山传给胡翰的“十二运”理论是欺人之谈。

20世纪80年代，对黄宗羲深有研究并点校过《明夷待访录》的吴光先生，提出《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原名《待访录》”，“‘明夷’二字，当系后人所加”。其根据是：黄宗羲在《破邪论·题辞》中说“尝为《待访录》”，顾炎武给黄宗羲的信中用的书名是《待访录》，黄百家的《梨洲府君行略》和邵廷采的《黄文孝先生传》也只用《待访录》之名。<sup>[10]</sup>

吴光先生的说法，学界有表示赞同者。笔者以为，吴光先生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虽然黄宗羲及黄百家等人用过《待访录》这样的书名，但不能证明这本书原名《待访录》；因为古人举书名常用简称，黄宗羲及黄百家等人所说《待访录》，不过是《明夷待访录》的简称而已。顾炎武在与人论学的书信中，曾说到“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五书》之刻”，“《五书》改正约有一二百处”；而全祖望所撰《亭林先生神道表》，谓顾炎武（亭林）有著作“曰《音学五书》”。<sup>[11]</sup>如果我们不加留意，还以为顾炎武的著作原名《五书》，“音学”二字是全祖望加上去的。

实际上，《音学五书》是本来的书名。再说，黄宗羲的《破邪论·题辞》中，不仅《明夷待访录》用简称，其他提到的书，包括《破邪论》，都是用简称：

……方饰巾待尽，因念天人之际，先儒有所未尽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夫论之美者，《酌古》《美芹》，彼皆战争经略之事；顾余之所言，遐幽不可稽考，一炭之光，不堪为邻女四壁之用，或者怜其老而不忘学也。<sup>[12]</sup>

《酌古》，指陈亮的《酌古论》；《美芹》，指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像这样用简称，可说是古人的习惯，并不意味着另有一个书名。

事实上，《明夷待访录·题辞》中，“‘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正是书名的破解。既包含有“待访录”的意思，也包含有“明夷”的意思。黄宗羲定的书名，应该就是《明夷待访录》。另外，现今所传黄宗羲为《留书》写的跋文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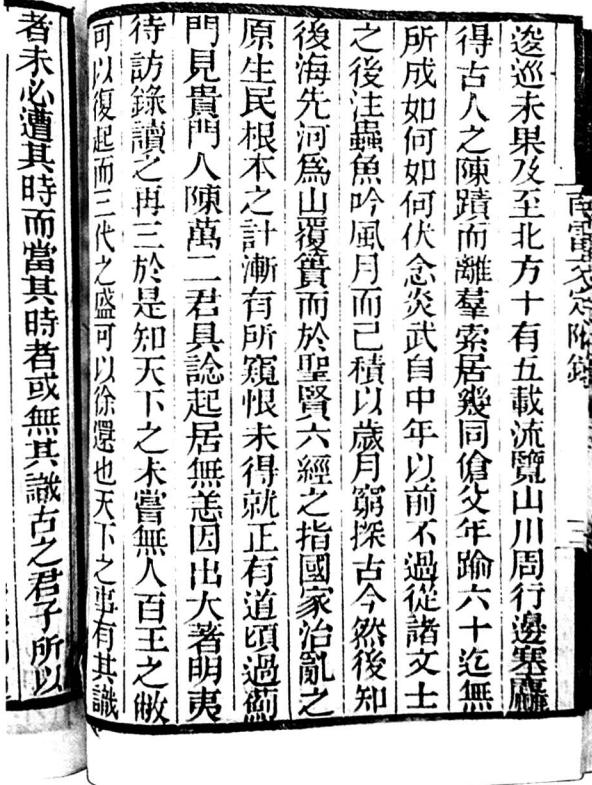
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筐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余弃之。甬上万公择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择之留也。<sup>[13]</sup>

黄宗羲本人两次使用《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更表明黄宗羲所题书名中，本有“明夷”二字。

至于顾炎武给黄宗羲的信，是由黄宗羲传出的。在黄宗羲的《思旧录》中引顾炎武信作“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sup>[14]</sup>；而附刻于《南雷文定》之后由黄宗羲手订的交游尺牍中所收顾炎武信作“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sup>[15]</sup>。黄宗羲两次提供顾炎武信，文字小有出入。顾炎武信中究竟是《待访录》，

还是《明夷待访录》，现在难以确定；但黄宗羲手订的交游尺牍中所收顾炎武信作“《明夷待访录》”，则可以表示《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本人认可的书名。

黄宗羲卒后四十余年，全祖望应黄宗羲的孙子黄千人之请，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认为黄百家的《行略》“固嫌嫌多未尽者”，乃“据摭公遗书，参以行略”，而后成文。全祖望此篇文字，不仅为了“勒之丽牲之石”，也“以为上史局之张本”，因而十分严谨。<sup>[16]</sup>碑文中著录黄宗羲的著作，如《明儒学案》《易学象数论》《律吕新义》《孟子师说》《明史案》《汰存录》《南雷文案》《吾悔集》《子刘子形状》《南雷文定》《南雷文约》



《粤雅堂丛书》内《南雷文定》书影 咸丰三年刊本

《思旧录》，等等，皆为准确的原书名。其所著录的“《明夷待访录》二卷”，肯定也是根据黄宗羲遗书并作过认真考究的。这一著录，进一步证明《明夷待访录》是本来的书名。

## 现代学人句读之误

上海中华书局早年编印《四部备要》，所收《明夷待访录》（据《海山仙馆丛书》本校刊）没有标点。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出版的《明夷待访录》标点本，主要有：1955年古籍出版社（社址在北京）出的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地址在北京）出版的标点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的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的点校本（以下简称《全集》本），是吴光先生负责点校的。吴光先生在调查版本、校勘文字方面下了功夫，但在断句和标点方面因袭了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标点本的一些错误。不言而喻，凡是断句错误的地方，即表明点校者没有完全弄明白原文的意义，当然也会妨碍广大读者对原文的解读。

笔者曾在安徽《古籍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明夷待访录〉标点本拾误》，指出《全集》本存在的十多处断句的错误。

《明夷待访录》全文不过两万字，通行的标点本竟有十多处断句的错误，其误读所占的比例也够大了。《〈明夷待访录〉标点本拾误》已收入华中师大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文史丛考——李广柏自选集》（“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文库”之一）。这里不拟将《全集本》十几处断句的错误一一列举出来，仅选择几处略加分析。

《明夷待访录》共二十一篇，即《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

《田制一》论述井田制破坏以后天下

的赋税一代比一代加重，百姓一代比一代贫困。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是这样：

儒者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矣。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sup>[17]</sup>

从1955年古籍出版社的本子以来，这一段话都是这样标点的。因为断句有误，魏晋与唐的顺序被颠倒了。其中“儒者曰”所引儒者的话，见胡翰的《胡仲子集·井牧》<sup>[18]</sup>，本是胡翰的原文，应该打引号；不打引号，便把胡翰的话与黄宗羲的议论混淆了。这一段文字的正确标点应是：

儒者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矣。”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

《田制三》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是这样：

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sup>[19]</sup>

贡、助、彻，相传是夏商周时代的税法，见《孟子·滕文公上》。“止税田土”，即只征收土地税。魏晋的所谓“户调”，是按户征收的税，即“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意思是在土地税（田赋）之外又加了户税。“户调”二字，不能用顿号隔开；犹如“田赋”一词，不能在“田”与“赋”之间打个顿号一样。

《晋书·食货志》记载：曹操在邺都时，除每亩地收四升粟的田赋外，另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sup>[20]</sup>这每户征收的绢绵，就是魏晋时期的“户调”。

《田制三》又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这样标点：

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sup>[21]</sup>

如照这样标点，读者便会认为明朝的